

外国在西藏的扩张

1888—1919

〔苏联〕B.П.列昂节夫 著



民族出版社

J12

24

1



外国在西藏的扩张

1888—1919年

〔苏联〕B.П.列昂节夫 著

張方廉 譯

(内部发行)

民族出版社

1959年·北京

В. П. ЛЕОНТЬЕВ

ИНОСТРАН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В ТИБЕТЕ

В 1888—1919 Г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6

本書根據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56年版譯出

目 次

序	(1)
引 論	(5)
第一章 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的发端	(9)
一、外資侵入西藏的初步嘗試	(9)
二、强迫“开放”中国与印度方面的国外 貿易的1888年战争	(19)
三、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經濟侵略	(33)
第二章 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	(51)
一、武装侵略的准备	(51)
二、侵略軍侵入西藏	(63)
三、西藏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	(73)
四、英帝国主义被迫放棄立即占領西藏的企图	(96)
第三章 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 主义在西藏的扩张	(112)
一、辛亥革命前夕的西藏情勢	(112)
二、辛亥革命和西藏事变	(132)
三、西姆拉“三方”會議	(148)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帝国主义者 在西藏的政策	(157)
結 語	(169)
一、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失敗	(169)
二、自由西藏一瞥	(183)

序

帝国主义国家对他国人民，特别是对落后国人民的控制奴役和一貫掠夺是其资本主义利潤的主要源泉之一。

在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的領土业已分割完毕。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分割世界，不断进行残酷斗争。“财政資本实行殖民政策，除了无数‘旧的’动机以外，又加上了爭夺原料产地、强先輸出資本、爭夺‘势力范围’（即能够成立有利的契約、取得租讓、取得壟断性利潤等等的范围）以及爭夺一般經濟領土等等的动机。”①

封建的旧中国是資本家予取予求的俎上肉。美、英、日、法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一向对中国人民执行敲骨吸髓的殖民政策。至于帝国主义者曾經处心积虑想把西藏——中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变为他們自己的軍事战略前进基地，那就更是世所熟知的了。

殖民国家統治集团对中国西藏地方的强取豪夺政策，遭到西藏和全中国人民的坚强抵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终于未能从中国夺去西藏。他們之所以沒有得逞，是受了以下几种情况的阻碍：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特別日見劇烈的东方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之間在亚洲和全世界的矛盾，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及由于这一斗争的大功告成而使西藏得以于1951年获得和平解放，使藏族人民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版，第293頁。

得以与伟大中国的各族人民团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之内。英国和美国的扩张活动，是1951年以前西藏人民停滞在落后于现代数百年的发展阶段、西藏仍然保持古老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的任务是要在这本小书里叙述从1888年至1919年外国在中国的西藏地方进行扩张活动的经过；揭露这种扩张活动的目的和伎俩；说明藏族人民为争取自由所作的英勇斗争及其在斗争过程中与伟大汉族人民团结一致的重要意义。本书以摘要叙述帝国主义国家从1919年至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这段时间内对西藏的政策作为结语；除此以外，还摘要举出西藏人民在1951年以后过着自由生活的某些实际情况。

外国在西藏的扩张活动，在现代历史文献上，包括苏联的历史文献在内，尚无充分的阐释。革命以前的俄国东方学中，也没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专著。至于外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特别是英美两国的历史文献，凡是涉及因帝国主义者在中國这个地区进行扩张活动而激起事变的种种经过，其所作的解释无一不是颠倒黑白的虚构。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各种著作，是理解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锁钥。俄国东方学家及研究亚洲和西藏高原的专门著作、档案资料、外交文件、当时的报章杂志和纪实性文学等等，则是本书取材的主要来源。

俄国东方学家在研究西藏方面贡献甚大。俄罗斯国籍的布里亚特人扎雅耶夫（Заяев）的第一部记述西藏的作品脱稿于1741年^①。从18世纪起，俄国国内已开始有系统地研究西藏，

① 蒙古原文参看《蒙古文选》，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29—41页。

至18世紀末，即出版了几种由汉文譯成的俄文書籍〔执笔者为列昂节夫（А.Леонтьев），烏斯品斯基（В.Успенский）等〕，其內容全是說明西藏居民和西藏的各种情况的。俄国东方学巨匠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的各种著作是关于西藏及其居民之历史的最好資料。著名的俄国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科茲洛夫（П.К.Козлов）、崔比科夫（Г.Ц.Цыбиков）、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彼烏佐夫（М.В.Певцов）等人于19世紀后半叶和20世紀初年在中亚所作的調查，对研究西藏非常重要。苏联学者居涅尔（Н.В.Кюнер）专门研究西藏的《西藏地輿志》也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史料的重要来源是国家档案庫：俄国外交政策档案庫、国立中央軍事历史档案庫、苏联科学院档案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列宁格勒国立中央档案庫。《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一書所公布的資料，《紅色档案》杂志等等有关中国与英国、俄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相互关系的各种条約、协定以及協議的条約彙編，本書均有所采用。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經公布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文件，則已用于本書的“結語”。

苏联作家于20年代和30年代在苏联国内发表的許多闡述帝国主义国家在西藏所行政策的論文均經仔細參閱。本書所征引的尚有苏联和中国作家最近出版的著作（如刘貫一著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簡史》）。这些著作作为系統地、徹底地揭露資產階級作家在西藏学方面的各色杜撰打下基础。

除专门研究西藏的各种著作外，本書还征引了苏联学者关于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經濟方面的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各研究員的著作。

从英国政府的文件中采用的史料，有自1889年至1910年的

所謂《藍皮書叢刊》里的“有關西藏的各項文件”。最重要的英文資料是1886年至1917年這一時期內的英國國會辯論報告。有些材料則是從英國外交部史料組編的參考資料《西藏》、《中國對外貿易通信集》和《大英百科全書》摘引來的。

當時在俄國、中國、印度、英國和其他國家出版的雜誌報章，都是很珍貴的史料。

遍歷西藏的旅行家以及直接在西藏推行外國資本主義政策的當事人，如波格爾(G. Bogle)、忒涅(S. Turner)、霍集(A. Hosie)、瓦德爾(L. Austine Waddell)、坎德勒(E. Candler)、河口(Э. Кабарчук)、洛克希耳(W. Rockhill)、榮赫鵬(F. Younghusband)、柏爾(C. Bell)、麥克戈芬(McGovern)等人的大量札記、日記、報告、傳略等記述性資料，亦經作為史料採用。

引 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写道：“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①

汉藏两族人民之间向极密切的相互经济关系，决定他们应当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内。

西藏自古以来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和藏族人民的友谊可以溯源于古代。关于藏族最早的记载仅仅见于中国史籍②。

古时，藏族散居于现今的青海和西藏境内。正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汉族即与定居现今四川境内的藏族部落有了亲密的关系和交谊③。藏族从汉人输入“育蚕、造纸、制墨、酿酒、碾磨等等进步技术”④。他们从汉人学会制造陶器，调制乳脂干酪和纺纱织布。西藏使用的

①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8日。

② 俄国研究藏族历史的东方学者均极其推崇这些史籍。著名的俄国东方学家比丘林（19世纪时代俄国东方学傑出代表之一），在其根据中国史籍（《廿三史》、《通鑑綱目》、《一統志》）所編著的《西藏青海史》一書的序言中写道：“除聖經以外，沒有哪一本古代史對於古代各民族是象中國人對其四鄰各民族人民所作的記載那樣，能追溯到切近其起源的。”

③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载《学习》杂志，1950年，第3卷，第1期。

④ 吕振羽：《中国民族历史》，北京1951年版，第129頁。

織布机也是从中原輸入的。这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輸入，都对西藏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两汉三国时代（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許多少数民族，其中包括部分藏族，均为汉族所吸收同化^①。从7世紀起，許多汉族学者应聘到西藏去。他們携往西藏的有天文、历算和許多重要書籍，其中有《詩經》、《左传》之类的古典著作。当时，西藏名門巨族的子弟也被派到唐朝学习。汉族文化传入西藏，促使西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藏汉两族之間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极为亲密。这就有理由認為，~~从~~从这个时候起，藏族即为伟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員”^②。

到8世紀，唐朝与西藏之間的政治关系业已巩固起来。唐朝皇帝冊封藏王以封号爵位；藏王也不断給中国宫廷納貢，表示臣服之意。比丘林首先发表他在中国王朝的地輿志（《一統志》）中讀到的唐朝皇帝与藏王在822年（长庆二年——譯者）会盟的約文。这个“伟大的和永敦睦誼的”盟約充滿互相尊重的精神。它是汉藏关系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文献^③。盟約全文刻于建立在拉薩的一座石碑上，迄今仍完整无缺^④。但是，由于上述盟約与中国建立密切联系的西藏不久即因居于藏境之外的藏族部落的崛起而陷于分裂。公元875年，这些部落的一

① 范文瀾：“中华民族的发展”。

② 张国华：“西藏和平解放兩周年”，載《人民中国》，俄文版，1953年，第10期。

③ 比丘林：《西藏實地史》，俄文版，第2部，第178頁。

④ 刻盟約的石碑向为英人所重視，他們企图任意曲解原文的精神。例如，在1904年有瓦德爾，1920年有柏尔，不久以前尚有李查遜，均曾仔細研究这个盟約的約文。据李查遜說，柏尔，尤其是瓦德爾，在翻譯和注解这个約文时，都把基本情况搞錯了（見李查遜著：“拉薩的古代历史文告”）。

他們沒有哪一个願意找出盟約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只有比丘林才真正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会盟双方力求和平相处与團結一致。

位領袖拓拔思恭在中國現在的寧夏境內建立政權，為此後蔚為中亞大國的唐古特人的西夏國奠定基礎。西夏的高度文化主要是接受於中國的，其文字與漢文相似。中國書籍，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至正朝儀》等^①，均經譯成西夏文。西夏國的文化係倣自中國這一點，經以研究中亞著稱的科茲洛夫，在哈拉—霍托古城遺址指導發掘所得的考古學資料所証實^②。另一部分藏族部落在青海甘肅一帶建立吐蕃國，嗣後併入中國了。西夏國王曾經接受中國冊封的“王号”^③。這種情形，直至1227年西夏為成吉思汗的大軍所征服，旋被併入蒙古帝國以前，都沒有什麼變化。過了不久，西藏全境也併入蒙古帝國的版圖。在1275年，元帝忽必烈授權薩迦寺八思巴喇嘛管理這個邊疆地區之後，西藏始有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④。

西藏在8世紀始有喇嘛教。喇嘛教是流行的佛教教派之一，其教長于1576年獲得“達賴喇嘛”的稱號。從18世紀中葉起，達賴喇嘛開始執掌西藏的地方政權。

清代管理西藏的大權集中於理藩院，該院組織條例寫道：“西藏分為兩個主要部分，即前藏、後藏。為了適應此種劃分，宜派駐藏大臣兩員前往……統轄西藏各級行政機關的大

① 呂振羽著：《中國民族簡史》，第131頁。

② 關於哈拉—霍托古城發掘所得的結果，可參閱科茲洛夫著的《蒙古、安多和哈拉—霍托古城遺址》。

③ Н. Я. 比丘林：《西藏簡史》，俄文版，第2部，第121頁。

④ 神權政體的統治形式和大量寺廟——剝削西藏農民的最大封建中心——的星羅棋布是西藏封建制度的特點，它具有封建生產方式一切落后的特征：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直接生產者被賦予某些生產資料，農民對封建主的人身依附，技術水平非常低下，等等。

权委由該駐藏大臣等执掌。”^①

駐藏大臣的制度起源于1727年(清雍正五年——譯者)。所有西藏大小官員和各級喇嘛統歸駐藏大臣管轄。無論民政或軍事的處理均須受駐藏大臣的監督。西藏地方當局不得與外國有公文來往，這是駐藏大臣的執掌。駐藏大臣監督西藏的稅收和財務開支，各種公產亦歸其管理。他們有權把任何不遵定制者交付法庭懲處。駐藏大臣的權力還不限于民政方面，他們還決定一切喇嘛寺院堪布的選任事宜，其中包括達賴喇嘛的選任事宜。達賴喇嘛充任西藏地方首長，須經清帝裁可。誠如比丘林譯的那本《西藏紀事》所公正指出的那樣，西藏屬於中國，但有其“因時制宜，適合地方情況的政治機構”^②。

西藏全境分為幾個大行政區。這些大行政區又是由53個行政單位——宗——組成的。綜管后藏政教的班禪喇嘛是西藏仅次于達賴喇嘛的宗教教長，他駐在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班禪喇嘛在西藏西南部的勢力特別大。

在外国資本侵入的前夕，西藏內部生活的特点是農民與封建主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西藏農民自有史以來即不斷與壓迫者進行自發的鬥爭，這種鬥爭隨着外國勢力滲入西藏逐漸劇烈起來。與此同時，西藏封建主相互分為敵對集團的裂痕日深，使外人在西藏的陰謀詭計易于實現。

① 參看《清聖祖憲則例》，卷六十一。——譯者

② 盧華初（譯音）：《西藏紀事》，比丘林譯自中文、聖彼得堡1828年版，第134頁。

第一章

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的发端

一、外資侵入西藏的初步嘗試

欧洲国家在西藏进行扩张的响导先是传教士。其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1624年(明天启四年——譯者)左右由印度潜入西藏的葡萄牙耶稣会教徒安东尼·德·安夺德(De Androde)。接着,又有几名传教士到达西藏,但他們在1652年統統被地方当局驅逐了。从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譯者)起,天主教托鉢僧团的僧侶在西藏大肆活动。1724年(清雍正二年——譯者),該托鉢僧团教会竟在拉薩获得修建教堂和住宅的地皮一段。

传教士的正式活动并无成效。例如到托鉢僧团所設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基督教徒总共只有11人,而还多半是在尼泊尔出生的。教会“惨淡經營”十六年的結果只此而已。但是,在送往羅馬的札記和与教皇的面談中,这些僧侶却不断将各种有关西藏政务、商情、民間风习、交通、軍隊和最大僧侶封建主的个人品性等情况詳加报导。传教士在西藏宣传的主要目标在于抬高喇嘛教的作用和喇嘛教領袖的权势;削弱中央政府的俗权,以便在西藏封建主中促成分立活动。

传教士的活动激起全藏的不滿。至1741年(清乾隆六年——譯者),他們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不久之后即不得不完全退出

西藏。

在資本主义国家中，英国政府首先在西藏推行强硬政策，目的在于扩大英国对西藏的势力，使其成为本国資產阶级的牺牲品；因自18世紀70年代起，英国政府能够利用距中国西藏地方不远的（印度）孟加拉省而得到侵略西藏的便利条件。

早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譯者）3月，东印度公司伦敦总管理处即已委托該公司駐印度代表搜集关于欧洲商品能否經過尼泊尔在西藏和中国西部找到銷售市場的情报^①。过了两年，公司董事会就提議派遣軍事考察团前往西藏边境。1773年果然有一个軍事考察团被派往不丹。不丹人坚强抵抗英国殖民軍隊，不幸遭到失敗。第一个所謂英国“使节团”的前往西藏，就是战胜不丹的后果之一。

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譯者）5月13日，孟加拉总督华伦·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仰承自己的主子英国資本家的意旨，派遣一个經過充分准备的偵查队前往西藏。在給該队队长波格尔的指示中，規定必須查明拉薩与西伯利亚之間的大片土地及其交通情况。偵查队受命搜集通往拉薩各条道路的情报，記明西藏地形、各种道路和居民的情况，并設法締結孟加拉与西藏之間的商約，如有可能，就爭取在拉薩設置英国商务代表机构^②。正如1783年派往西藏的英軍司令忒涅步兵上尉所写的那样，英国人之所以竭力向（中国）这个边陲地区渗透，是因为借此可以同清朝帝国建立关系，而不致象其他方法

① 薩曼(S. Cammann)：《越过喜馬拉雅山的貿易》1951年，第25—28頁。

②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彙事录》，第19卷，倫敦1875年版；《西藏旅行記和西藏与孟加拉之間的貿易》；馬克翰(G. Markham)：《乔治·波格尔出使西藏和托馬斯·曼宁旅行拉薩故事》，倫敦1879年第2版，第8—9頁。

那样足以引起“中国对外人从海上渗入的一切毒害常常不惜采取武力抵抗政策”^①的疑虑！

波格尔率领的侦查队只到过日喀则。该队签订正式商约的企图落了空；因西藏地方当局原无签约的权力，而且一般对侵占印度的英国人深怀疑惧。但该队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反动的封建主，并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据英国历史家证实，波格尔的西藏之行，在这一方面是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意义的”。英国当局拉拢了几个西藏的封建主。波格尔居然能使那些封建主对于扩大越过中印边界在西藏地方进行的贸易发生兴趣。

波格尔给英国当局带回关于西藏南部的各种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再一次证实与这个神秘边区建立关系的重要性。孟加拉和与中国接境的各国商人都满载黄金、细羊毛、麝香等贵重商品从西藏结伴而归。

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译者），英国派遣由忒涅上尉率领的第二个侦查队前往西藏。忒涅正式受权要求签订商约和准许英国商人在西藏从事贸易。忒涅及其随行人员在日喀则逗留达两个月之久，利用这段时间搜集边区的各种情报和测量行军路线。

忒涅把英国当局的丰厚“礼物”送给他们所结交的封建主，换取他们同意与英国商人扩大贸易。

忒涅侦悉中国中央政府和拉萨地方当局屡屡阻挠英人与西藏建立经常的关系^②，中国知道英人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作“西藏的主人”。和上次的情形一样，这回驻藏大臣又发表了清朝

① 志溥：《出使西藏班第达记》，伦敦1909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第245页，第253—254页。

③ 思涅尔：《西藏地舆志》，第1部，第1册，海参威1907年版，第49页。

皇帝禁止藏式湟和其他外人入境的詔書^①。

西藏封建主之間從來沒有巩固而持久的親陸關係。封建的分立不斷造成分歧和因宗教糾紛而分裂愈甚的封建領主之間的鬥爭。自從殖民國家初步嘗試擴大其對西藏的影響以來，一個反對中央、屈從外人的集團越來越明顯地分化出來了。這個集團與其餘封建主之間的矛盾，在西藏統治集團當中，逐漸成為壓倒其他一切分歧的主要矛盾。

西藏封建主的這種分化是由於經濟的利害關係不同。參加反中央集團的首先是這樣的一些封建主，他們的莊園靠近印度邊境或是出售外國最需要的原料的。

在外国資本侵入西藏以前，日喀則和西藏西南部的封建主主要與邊境各國通商，而拉薩和西藏東部的封建主則與中國內地各省及蒙古、新疆，甚至遠與俄國屬地進行貿易^②。促成這種分化的不單由於各自領地的地理位置（這當然不能忽視）和向有的聯繫，而最為重要的却是由於西藏不同地區某些專供市場需求的農業生產的專業化。例如，西藏西南的許多農場出售山羊絨毛，其最要主顧是克什米爾和印度；至於中部和東部的農場，則出售中國內地商人收購的大宗綿羊毛。中國內地是西藏藥香的基本主顧，而由西藏越喜馬拉雅山的輸出則是珊瑚和蘇達。

西藏的宗教封建主從源源不斷的香客方面獲得極大的收益。顯然，中國內地各省、新疆、蒙古以及俄國的喇嘛教徒都把自己的禮物和積儲送往拉薩，而作為喇嘛教第二個中心的日喀則卻只能收到喜馬拉雅山附近各地喇嘛教徒送到西藏的部分

① 雖然地方統治集團和封建主多有親自從事商業活動的（最常見的是雇用專人擔任），但在西藏與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所進行的貿易上起主要作用的却是漢族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尼泊爾、克什米爾和不丹的商人也多有在西藏經營商業的。

礼金，因为这些教徒也和前者一样，总是竭力想把礼金献给拉薩的。另一方面，把西藏西部的一个湖泊（瑪那薩罗瓦湖——譯者）和开拉斯山视为圣地朝参的印度人却常往后藏，很少去拉薩。由克什米尔和喜馬拉雅山附近各国接踵而来給达賴喇嘛献礼（貢品）的定期使节团是西藏南部人民的一个沉重負担，他們須在由边境至拉薩的全程上，供应成百上千的騾馬运送礼品和使节团随員携带的貨物。

至于班禪喇嘛及其左右亲信的封建特权，則因达賴喇嘛受到北京王廷的偏爱、占据西藏地方政权的首位而大遭損害。

外国統治集团有力人物的誘惑促使（促其实现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部分西藏封建主傾向异国。

忒涅旅行归去后，英国統治集团企图在西藏树立英国势力的野心益发不可遏止了。

18世紀80年代的末叶，英領印度当局唆使尼泊尔的廓尔喀部落侵犯中国的西藏。他們的如意打算是：如廓尔喀人获胜，即可通过該部落的領袖扩大英国对西藏的影响①。

在西藏人民处境艰危的时候，有些亲英的封建主竟馳書英国当局，明白表示他們希望英国武装力量开到西藏②。如果考虑到馳書人曾揚言不願看到駐藏大臣請求抵抗廓尔喀人入侵的中国軍隊开进西藏的話，那末，西藏部分封建上层帮助英国統治集团实行侵略阴谋，借以从中漁利的意图就是昭然若揭的了。

① 从7世紀起，尼泊尔即归西藏統治，嗣后为中国的藩屬。至18世紀中叶，有些尼泊尔的封建公国遭到廓尔喀人的襲击，尼泊尔的整个中央谷地不久即为其所侵据。英領印度当局馬上看出与廓尔喀部落好战領袖建立友誼的一切利益。英国殖民集团指定方針要利用廓尔喀人为自己在亚洲的这—地区实现侵略目的。

② 薩曼：《越过喜馬拉雅山的貿易》，第115頁。